



编者按

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一群出生于台湾省的同胞最终定居于大陆。岁月沉浮,如今他们多已进入暮年,走进他们的乡土记忆、聆听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生活和对两岸交流的感悟,正是两岸关系大历史的生动体现。从本期起,我们开辟《大陆老台胞忆峥嵘岁月》,邀请曾任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台湾代表团的代表、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的代表以及台湾省籍全国政协委员,讲述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乡愁记忆。

海峡两岸,都是家

口述 张桂珠 整理 本报记者 修菁

1949年,我随在大陆定居的阿公到厦门玩,没想到从此与在台湾的父母相隔海峡终不得见。离开基隆港时,母亲背着2岁的弟弟,一直向我招手,放下对远行女儿牵挂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心底。此岸与彼岸,这条归乡路,于我竟苦苦等了2.6万多个日升月落。希望两岸不要再有隔绝,两岸同胞走近,最终团圆,是我们共同的期许,也是责任和使命。相信我们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

■ 招招手,别离基隆

1949年,居住在厦门的外公(我们叫他阿公)从厦门来到我们位于基隆的家做客。阿公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并邀请我们一家人到厦门游玩。听母亲说,阿公在厦门做生意,生活很富裕,厦门景色也很美,我和姐姐都吵着要跟阿公到厦门玩。那时,父亲在基隆一家电灯公司做工程师,但因为一次事故被炸伤,影响了正常工作,母亲又是家庭主妇,所以一家人生活很拮据,我和姐姐很少有到基隆以外的地方玩。

阿公本来是要带姐姐去厦门的,但他离台的日子离姐姐去日本念书的日子很近,所以在我的申请下,母亲同意让我跟着外公去。那时离台到大陆也要办证件,还要照相,母亲说,如果来不及,你就不要去,没想到的是,在最后一刻,我拿到了跟外公赴厦要用的证件。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母亲背着2岁的弟弟,一手牵着我,坐上人力车,奔向基隆客运码头。因为我从没出过远门,一路上,母亲反复叮嘱我,到了厦门,一定要听阿公阿嬷的话,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我们到码头后,阿公已经上船。船很大,而且马上就要开船了,一家人都很着急,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阿公。就在母亲打算把我带回家时,我从很多乘客的身影中找到了阿公。阿公听到我叫他,从甲板上伸出头,叫我赶快上船。就这样,一人传一人,我被抱到了大木客船上。坐上船的我,很开心,还从窗户里探出身,跟母亲挥手道别。

穿着小裙子小皮鞋,带着欢笑,和岸上家人招手的我,不曾想到这就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别,我与家乡台湾40年的别离。我的行囊只有母亲简单帮我收拾的几件夏装,因为我们只是想跟着阿公到厦门游玩几天。然而,命运就这样让我与大陆深度联结,这一年,我7岁。

■ 少年在厦门

阿公是浙江人,去台湾做生意

意时,和在桃园长大的阿嬷相识结婚,后来两人定居在厦门江头,就是今天的厦门台湾街一带。

刚到厦门时,我没有玩伴,只能每天乖乖地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左邻右舍很多大人小孩都跑过来看热闹,想看看这个台湾来的小女孩长什么样。

因为身边只有我一个外孙女,阿公阿嬷对我很疼爱,还雇保姆照顾我,要什么有什么,吃穿不愁,我在厦门乐不思蜀。因为一时回不了台湾,我到了上学年龄,阿公就安排我在厦门上小学,并帮我重新取名,叫张桂珠,不再使用在台湾时使用的名字“珠露”。

当时我少不更事,不太能理解两岸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印记深刻的是,每次陪年事已高的阿嬷去医院,路上她总是叮嘱我要熟背基隆老家的地址。阿嬷说,“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台湾回不了,我可能见不到你母亲了,但你要熟背自己家的门牌号,以便哪天能回到台湾,或者见到台湾的亲人,好好相认的物证。”

我家的地址是台湾省基隆港八番地,我的母亲叫张富,父亲叫张世助……在阿嬷的叮嘱下,这些台湾家人的信息,清晰刻在了彼时7岁的我心中。阿嬷还让我把从台湾穿来的那双红皮鞋用一只小皮箱保存起来,以便作为和台湾亲人相认时的物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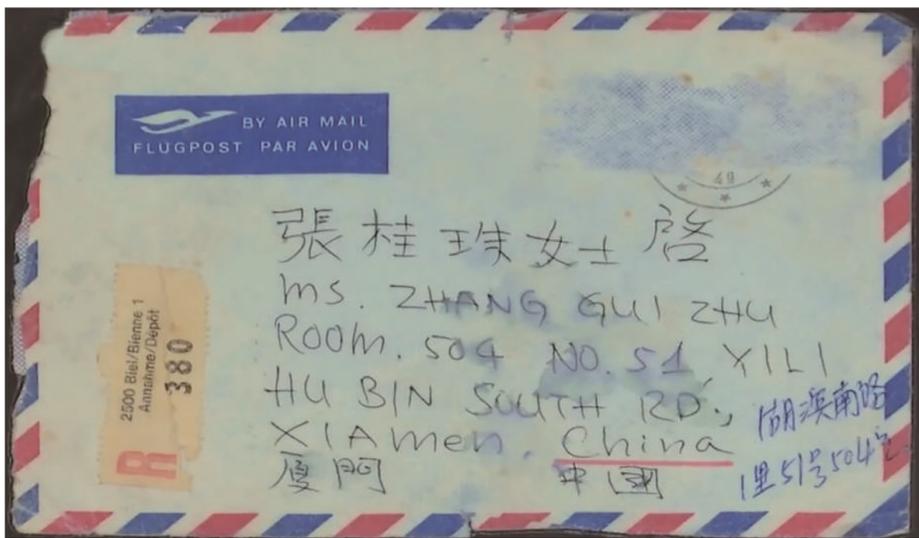
1960年,疼爱我的阿公去世了。阿嬷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将来我无人照顾,便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阿嬷想着一定要给我找一个“身份”好的人家,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爱人,家里“身份”是贫农,又是转业军人的大陆男人,结了婚。

■ 成长在大陆

除了不能和在台湾的父母相见,我来到大陆的生活和成长过程都很顺利,只是加入中共党组织这段经历比较坎坷。因为父母都是台湾省籍身份,我连续递交了8次入党申请书,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我才被中共党组织接纳。从我内心来说,我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荣。在厦门市第二纺织厂当女工时,每次开会说到让党员同志留下来,我心里都特别期待自己也是党员。至今,我已光荣在党40多年了。

我能从一名普通纺织女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还要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养。1973年,我在车间干活时,接到通知,让我去北京开会,说全国人大要成立台湾省代表团,我作为在闽台胞被推荐为代表团的代表。我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



1985年,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让张桂珠与岛内的亲人时隔35年重新建立联系。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由12名在大陆常住的台湾同胞组成,其中有4位是妇女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会议开幕那天的空席,周恩来总理特意来看望代表团的同胞们,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远远地看到周恩来总理向我们走来,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由于心情特别激动,手忙脚乱中我不小心碰到桌上的特制铅笔,匆忙伸手去接时,鼻尖又扎进我手掌,我手上至今还留着一条黑色的印记。

参加这次会议后,我身上的身份使命感和责任感被唤醒。从北京回到厦门后,我一边向工友们宣传人大会议精神,一边坚持生产,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走访在厦的台湾同胞。当时,我常想,如果在台湾的父亲母亲和岛内的同胞也能像我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该多好啊!在当时的两岸关系下,通过广播双向对方喊话的方式,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宣传战。我带着朴素的心理,曾到对台前线广播电台,把心里话说给在台湾的阿爸阿妈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也放心我在大陆这边。我说,从1949年和阿公来厦门,我在这这里受中共的培养和关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幸福成长,我先后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不仅帮助在大陆的台湾同胞过上幸福生活,也组建了自己的幸福小家,从一名纺织工人成长为国家干部。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阿祖的故土》中,还讲述了我的故事。

■ 缺席的合家欢

1985年,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打破了我彼时平静的生活。是侨居在瑞士的表姐(我姑姑的女儿)受家人委托,写给我的。表姐在瑞士听国内广播时,恰好听到我的故事,此时正值我母亲重病,她便想到以家

书通知的方式,请求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能够帮忙联络国内,把家书转给我。

我至今记得收到表姐家信的情景。听说有厦门市公安局的人找我,我慌慌张张从单位回到家,心想我又没有犯法,怎么会有公安局的人找我?进家门见到公安局的同志说明来意,我哭了一个晚上,越想越心痛,反反复复翻看信的同时,我想,既然表姐能找到我,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很快能联系上父母?

后来,我和表姐开始不间断地通信,1986年我们相约在香港见面。这是我和台湾亲人分离37年后,第一次见到台湾的亲人。表姐见面喊我一声“珠露”,我们俩抱头痛哭,泣不成声。由于当时表姐是从香港转机台湾,按规定只能在香港逗留一天,所以那个晚上,我们聊到了很晚,伴着表姐讲述这些年家里发生的事,拼凑出我在这个家庭缺席的记忆。临别时,我和表姐约定,由她回台湾联络,我在香港等台湾家人的回电。

可谁知表姐这一去,便音讯全无,我在等待和期盼中度过了整整2个月。就在我朝也盼,暮也盼,眼看签证就要到期,几乎要放弃等待回到大陆的时候,酒店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我姐姐、弟弟熟悉的乡音,但唯独没有听到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我得知母亲当时病已很重,不能起床说话,后来直到母亲病故我也没能听到她的声音,成为我今生的遗憾。

脚步再回故土,是一年后的事。1987年在众多思乡心切的大陆老兵掀起的返乡探亲运动中,台当局宣布开放部分台胞回大陆探亲,两岸隔绝藩篱终于打破。厦门港和平码头上迎来了一批批来自对岸的亲人,那时,我已任厦门市台联副秘书长,常常接待来自台湾家乡的客人,触景生情,我回乡看望自己亲人的心也很迫切。

然而,回家之路遥遥无期,台湾那边拒绝我赴台的那张公函,被我一直保存至今。因为我从年轻时就积极参与大陆的对台工作,后来又从政,成为台当局返台探亲的拒绝对象。后来,我得知,父亲去世后,弟弟跟着母亲一起做生意,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害怕之下,弟弟在1974年以“死亡”为由,注销了我在台湾的户口。

后来直到2002年中秋节前,我回台探亲的心愿才终得以实现,此时离我离开台湾已经53年。古人说,“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回家那天恰好是中秋,在一轮皎洁的明月映照下,看着母亲曾经睡过的床铺、生前上香的佛龕、待过的庭院,我忍不住痛哭,慨叹历史伤痛带给我们小家的离散伤痛。

听邻居说,母亲生前最惦记我,最后病很重了,还整天坐在门口念叨我。弟弟告诉我,每年除夕吃团圆饭时,爸爸总要多放一副碗筷,好像我还在他们身边一样。而我,他们最疼的“阿珠”,回乡只能到他们的坟前上一炷香,表达他们亲爱的女儿对二老的无尽思念。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浪。鼓浪屿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鼓浪屿之波》是我喜爱的一首歌,每当歌曲的旋律响起,我心里都忍不住会跟着哼唱,“我渴望,我渴望,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这句歌词唱出了我心底的深层情感。两岸同胞同根共生,同气连枝,希望我的故事永远成为历史,希望两岸亲人离散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后代子孙不要再受动荡飘零的人生苦楚。台湾岛,像一艘船,承载的是两岸亿万同胞共同的命运与追求。岁月写尽悲欢离合,台湾终要归航,民族终要团圆。

(感谢厦门市台联和刘薛萍女士对本文提供的采访支持)

大陆老台胞忆峥嵘岁月

文化速递

第九届“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论坛”线上举办

第九届“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论坛”6日通过上海和台北连线的方式召开,两岸近百名嘉宾通过云端,围绕中华传统节日中元节的民俗礼仪和文化内涵进行交流研讨。

本届论坛由“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发展而来,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与台湾中华诗词艺术协会联合举办。论坛通过纪录短片、诗词朗诵、书画笔会、学术研讨等多样化活动形态,探究了中国人敬祖孝亲、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突显了中华文化儒释道和睦相处、相互融合的鲜明特色,展示了两岸血脉亲情的文化基因。

在学术讨论环节,两岸专家学者围绕“携手传承民俗礼仪、共同发展中华文化”的主题,从文化探源、仪式建构、融合演变、传承发展等视角,对中元节的民俗礼仪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认为,两岸民俗专家应同心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缪璐)

京台专家研讨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弘扬

本报讯(记者 修菁)由黄埔杂志社主办的第一期“文脉中华”沙龙4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弘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秘书长宋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韩晓光,以及两岸青年70余人出席本次活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郭继承在讨论中指出,中华文化在几千年延绵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灵归属。近代中国曾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秉持家国情怀,战胜了外来侵略,守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以史为鉴、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也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台湾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表示,文化与教育是紧密联系的,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面临一定危机。但他认为,台湾文化产业脱离了中华文化根脉和底蕴是无法长久发展的,两岸同胞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信心,珍视并爱惜中华文化,分享和传播中华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台湾研究室教授艾允,分析了诸多台湾文学作品,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陈映真的《将军族》、余光中的《乡愁》、白先勇的《花桥荣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无一不体现着台湾同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十分重要,要不断发扬黄埔精神,做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推动者。

“两岸乡村振兴谈”展现两岸融合的文化密钥

本报记者 照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IP借助创意和营销成功破圈,乡村的文创产品怎么才能做得更有文化味更好玩、更有品质呢?8月1日,由海峡青年创业学院发起的“两岸乡村振兴谈”第五期直播课程活动在厦门举行,以展现两岸融合的文化密钥,共吸引了近523万人次参与及观看。

据记者了解,“两岸乡村振兴谈”系列直播课程由两岸融合的经典案例构成,透过乡建这个课题,发现培养台胞优秀青年代表,增加认同与共识。该活动邀请两岸著名专家学者及本地台青,实地探访找寻厦门两地有记忆的人、物、事,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呈现。

台青强森是参加此次活动的嘉宾,他曾在台湾从事多年乡村基础改造工作,现已扎根厦门。他经常带领两岸大学生组成的“青青志愿队”深入闽南乡村,并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现乡村之美。强森告诉记者,两岸大学生应该为每个乡村搜寻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多多走进村居、与当地居民互动。

“广大天地在农村大有可为”,来自台湾的施盈竹有着国际志工的经验,她致力于用自己的专长为乡村做一些事情。活动中,施盈竹分享了在大陆农村的故事,自2017年起,她从垃圾分类、环境治理、活化闲置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社造尝试,在全国不同的村庄均有收获。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杨剑飞教授表示,乡创文旅IP的打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行为,不仅要符合消费者的新习惯,还需不断与时俱进。希望借助更多两岸青年的力量,让越来越多人深入参与这场推动两岸乡村振兴交流与融合的盛事。

据了解,“两岸乡村振兴谈”的线上课程,前4期课程已在全网累计吸引近400万人次收看教学内容。

《梦里杜鹃花》:一部两岸电影人携手创作的“梦之花”

本报记者 修菁

日前,由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导演薛颖植执导的新片《梦里杜鹃花》在大陆网络视频平台上映。

薛颖植出生于台湾屏东,2016年“登陆”发展,2019年来到武汉追寻自己的电影梦。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他选择留在武汉,用镜头记录下了疫情期间这座城市的冷暖叙事——《76天:中国台湾导演在武汉》。“我想把我看到的真实的武汉,带给我的台湾朋友,也有蛮多台湾朋友看到我的这部片子,被感动到。穿越海峡,我们都是家人。”他告诉人民政协报记者。

也正是在武汉经历的这段特殊时期,触动薛颖植要拍一部与爱有关的电影,“希望传递珍惜当下、积极面对生活的人生态度。”他说。

电影《梦里杜鹃花》充满了穿越时空的色彩,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一对年老

多病的夫妻穿越时空,重回青年时代的故事。故事聚焦现实生活又富时代精神,“我觉得有点像电视版的《父母爱情》,又有点像电影《你好,李焕英》,我在改写剧本时,还特别加入了一些台湾元素,观众观影时又会感到有点台湾偶像剧的感觉。”在薛颖植看来,由于他作为台湾省籍导演身份的加入,电影《梦里杜鹃花》本身也带有穿越地域和文化气息的感觉。

“武汉是一座很有历史的城市,我和我的大陆合伙人穿梭于武汉的大街小巷时,他时常给我讲解这个城市的人文与历史、他在这里的成长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拍摄一部以武汉为故事场景的电影。”作为电影的联合编剧,谈到创作《梦里杜鹃花》这部电影的缘起时,薛颖植表示。

在创作《梦里杜鹃花》剧本的过程中,

薛颖植和团队在武汉做了一些街头访谈,“我发现很多老人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都很难忘并感到荣耀,明明现在的生活条件比那时好,但仿佛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很怀念那个年代。”通过合伙人讲述,薛颖植才知道,大陆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的人很质朴,整个国家也正在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这和我们台湾地区的同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我更想试图从他们的回忆中找到那些跟幸福有关的回忆。”他说。

为了创作完成《梦里杜鹃花》,新冠疫情防控的三年间,薛颖植一直没有回到台湾,电影制作本来拟由台湾团队完成的工作都改由大陆同行完成。“在电影后期的制作过程中,我通过云端方式和台湾地区的插画师、音效师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在美术和音效制作方面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同时大陆的同仁做事情也很

拼,新冠疫情加重了这部电影的完成难度,在拍摄方面有很多不便,但大陆伙伴们一直在铆着一股劲儿,工作十分敬业。”在薛颖植看来,《梦里杜鹃花》也是一部两岸电影人携手同心创作的一部“梦之花”。

谈到“登陆”6年,是否已适应大陆的生活和创作环境?薛颖植表示,“对于许多在大陆发展的台青,生活早已不止眼前的打拼,还有‘诗和远方’的追求。大陆的市场足够大,而且充满生机活力,在这种环境下,可以让自己的梦想可持续发展,倍增加速。”

薛颖植认为,电影能够承载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增进彼此认知的积极作用,“只要两岸人民相知融合,两岸就是一家人。”未来他希望自己能拍出融合大陆故事和家乡台湾故事的电影,也希望更多参与两岸青年电影人的交流合作项目,大家合力推动中国优质电影走出去。